

余秀华的诗歌不是大白话

——知名学者汪涌豪访谈



人物名片

汪涌豪,1962年生,宁波镇海人。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主攻中国古代文学与美学,兼及古代哲学、史学与文化批评。著作有《中国游侠史》、《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》、《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》、《言说的立场》、《中国诗学》、《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》等。

1月31日,他应邀在宁波大学园区(鄞州)图书馆“明州大讲堂”作题为《文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》的讲座。

三江访谈

□记者 陈晓旻

记者:汪教授,您这次的讲座是关于文学,您认为文学的意义是什么?和20世纪相比,如今的文学有哪些变化?

汪涌豪:我一直以为,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很不够的,文学其实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,说得准确一些,是人的一种获取精神自由的存在方式。它还可以超越现实的局限,让人放眼更广大的人生乃至宇宙,获得更本质更悠久的精神体验与享受。

中国的文学曾经承载着人们的情感认识、社会认识、政治认识,所以那时一部小说出来就会洛阳纸贵,需要了解情感的人从中学习情感,需要了解社会的从中学习社会。而在今天,文学已经进步,回到了文学自身,正是因为已经剥离了许多功能,文学不再是大众聚焦的中心,文学变得安静了,开始审视自己。

有人说文学创作一代不如一代,这个观点是不对的。进入21世纪,原来的众多作家莫言、王安忆、余华等还在创作,尽管他们的作品没有过去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么大,但是他们的艺术风格日趋成熟。只不过是今天大众的阅读习惯改变了,信息渠道越来越多样,娱乐方式也越来越丰富,大家不再聚焦文学,文学退回到了边缘。任何时候,文学处于中心都不是常态。

记者:现在的网络培养了人的浅阅读,有一个重要特征是从文字阅读转向图像阅读,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?

汪涌豪:网络带给人即时的便利资讯,而且是不需要创造就可以轻易获取,随时随地无限量无边界的免费享用,这是网络带来的好处。但是它带来的弊端也很明显,因为读图时代,人是被动的承受者。当然我们对于画面也可以探索,但是相对来说,阅读文字时调动的细胞活跃程度远远高于读图。文字是更抽象更虚拟的,在文字与画面之间需要通过想像去构造,所以阅读文字更能培养人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,也更能诗化人生。所以很多人是不看名著改编的电影的,一看就破坏了原来的美感。美国的卡尔曾经写过一本书《浅薄——互联网怎样毒化我们的大脑》,因为互联网的特性,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去探索,而是发散式地到处找,而且关注标题,关乎结果,而不在于过程。时间久了,就不习惯于书本的阅读,特别是长篇的阅读。美国哈佛的教授和英国的科学家曾经做过研究,本世纪以来,人类的智商在退化。人类刚诞生的时候,要向自然抗争,调动所有的力量和心智来赢得生存的最大可能性。而现在各种知识在网络上都是现成提供的,人类的大脑反而长期闲置,当然会造成萎缩。

这让人不禁想起两个世纪前托克维尔著名的发问:“为什么当文明扩展时,杰出的个体反而减少了;为什么当知识变得每个人都能获得时,天才反而再难见到;为什么当不存在较低等级时,较高等级也不复存在了。”原因固然与物质、技术有关,但更在于人避却思考、耽溺安乐的自甘平庸与自我放失,在于不能善于利用物质技术造成的心智的慵懒与偷惰。在这种慵懒偷惰中,那种对深邃思想的卓越追索,对人类整体性精神出路的关切渐渐消退和淡忘,甚至被嘲笑和放逐。而这些,恰恰经典里最多,甚至就是经典最显著的徽标。因此我是反对一味地读图和读网的,批判式思维的形成,更依赖人的“原始硬盘”——人经由经典阅读养成的智慧头脑,以及由其分析整理过的知识记忆。

记者:读图和读网对文学创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?

汪涌豪:一般而言,对于一个有追求的作家,读者的阅读方式对他的创作不会有影响。作家阎连科就说:“读者对我没有任何影响,甚至批评家对我也没有影响。我尊重他们的评论,但是评价的好与坏和我无关,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”当然也有一些作家会关注读者的反映,比如为了市场接受度,为了名声,会考虑加入一些社会大众关注的“热点”或者投读者所好的某些“趣味”。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该很少会这样做。

记者:您还主编过《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》,书名用的是“原典”,给我们解读一下它的含义。

汪涌豪:原者,源也,始也,端也。“原典”自然是指原初的意思,但更指原型的意思。认识文学世界的原型,称为“原典”。有的典籍如《论语》原初如何,后人不一定清楚,它是孔子和弟子的问答记录,或是由别人编定的一部论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书。但因为有原型的意味,依然是经典。这套书是为了配合学生学习本原性的经典而编的,如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等,它可以帮助学生构建认识中国乃至世界的原型,是中文系学生必须具备的素养的主要源出。

记者:您认为该如何培养年轻人读经典的习惯?

汪涌豪:不能光让年轻人和孩子读经典,家长自身的学习也非常重要,家庭教育和家长的言传身教具有决定性作用。现在的家长太爱孩子,习惯于对孩子的事情大包大揽,父母每天讨论各种现实的甚至势利的事情,难免会对孩子产生影响。比如有有的孩子想读中文系,父母硬要孩子读经济,复旦大学经常有学生想要从经济类专业转到中文系的。中国的父母习惯于把孩子紧紧抓在手里,把自己的现实价值观灌输给孩子,让孩子以自己设定的方式生活。所以不能撇开家长谈孩子读经典。最好的氛围应该是家里有一起读书的习惯,现在很多父母虽然是大学毕业,但是一出校门就把读书的习惯还给了老师。

记者:您还研究游侠,这是一个很让人好奇的领域,让人联想到金庸小说中的侠客,中国的游侠是怎样的?

汪涌豪:游侠的典型之处在于“施恩于不报之地”,一旦受助的人想要回报,他唯恐避之不及。游侠的助人之为只是为了完成自己心中的道义。某种意义上说,是为了自我满足。

我写《中国游侠史》的时候很早,出版是在1994年,是中国第一部游侠史,作为史学著作列入史学月刊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有两篇独创的名篇:《游侠列传》、《货殖列传》。《游侠列传》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、剧孟和郭解的史实。司马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,充分地肯定了“布衣之侠”、“乡曲之侠”、“闾巷之侠”,赞扬他们“其言必信,其行必果,已诺必诚,不爱其躯,赴士之厄困……不矜其能,不伐其德”等高贵品德。司马迁为什么会重视游侠文化,这跟他自己的经历有关,他曾经受过宫刑,本来他如果有钱或者官府有人就可以免于刑罚。但他是清官,同时又不太实际官府朋友,所以他深感在“缓急之际”危难之时有人帮助是多么重要!

中国的游侠是一个特殊的群体,亦正亦邪,所以才有历史上的“梁山好汉”。

记者:中国的游侠和中世纪欧洲的骑士有什么区别?

汪涌豪:中国游侠与欧洲骑士在精神气质和行事方式上有某些共同之处,但由于其社会地位以及所属社会阶级、阶层不同,二者内涵不一,文化差异明显。欧洲的骑士忠于领主,有行会、田产,甚至还有贵族的封号。而中国的游侠散落在江湖,司马迁时期还有与官府打交道的游侠,但是后来受到官府打击越来越散落民间。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骑士还忠于女性,而这点中国的游侠是做不到的。当然也有一些游侠被人利用,成为有钱人的家丁,残害百姓。但总体而言,中国民间的信仰中,侠义是很受推崇的,忠义勇武仁信等品质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体现了民众的社会愿望和理想人格。

记者:最近有个热点新闻事件,就是“脑瘫”诗人余秀华的走红,您如何看待她的作品和这种现象?

汪涌豪:我觉得,论一个诗人首先应该论他(或她)的作品,而不应该是他的性别、身份,更不要说他(或她)是否是健全的人,此其一。其二,余秀华的诗歌有比较纯正的文学性与诗性,不是分行的散文,更不是大白话。一个非专业的文学爱好者能写出这样的诗,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值得肯定的,何况她有几百首写得还真出色。其三,她的走红,一是基于人们对她与其诗之间所存在的较大反差的好奇,这一点我已说了,不足为训,再一是基于人们对专业诗人远离生活、盲目追随西方诗歌,一味卖弄意象无病呻吟的摒弃,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整个文坛与诗坛反思。我希望经由她的诗作,包括还有其他类似的“民间歌者”纯真自然的吟唱,我们能找回它原初的本质,乃至找回它应有的众多读者。

记者:您曾经说过:郭敬明的才能与文学无关。您觉得偶像式的作家对于文学的影响有多大?

汪涌豪:对主流社会没有任何影响。作为一个商人,他是成功的,但是他把文学作品当成商品,违反了文学的本意。有个老师逐字逐句地指出了他某部作品中的破句、残句和不通的句子。作为文学爱好者他当然够格,但是作为成熟的写作者,缺憾太大了。